

■
朱湘军 著

翻译研究之哲学启示录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翻译研究之哲学启示录

朱湘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统梳理了西方哲学与翻译研究的渊源关系,历史性地回顾和评介了西方哲学思潮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和启示,并通过反思、探究和发现中国哲学思想对翻译理论的作用和贡献,比较中西哲学思想在翻译理论表现上的共性和差异,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提供哲学理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研究之哲学启示录/朱湘军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313-09113-0

I. 翻... II. 朱... III. 翻译理论—哲学—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5498 号

翻译研究之哲学启示录

朱湘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8 字数:258 千字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

ISBN 978-7-313-09113-0/H 定价: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4742979

前 言

西方翻译事业始兴于古罗马对希腊文明的向往，故有人断言翻译是罗马人的发明（Eric Jacobson）。希腊文明从“荷马时期”（The Homeric Age, 1200~800B. C.）到古典时期（The Classical Period, 800~200B. C.），绵延近千年，史称“希腊文明”（The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其辉煌灿烂的文化广播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受其恩泽，拉丁文化青出于蓝，其中翻译，最是功不可没。当时罗马人的翻译论题常常围绕着“词对词（word-for-word）”的翻译或“义对义（sense-for-sense）”翻译来展开的，而“这个命题实际上是从‘以文本为依据，同时又以文本为依归’的视角提出来的。”（刘宓庆，2001:70）是建立在对翻译客体（文本）的比较基础之上的。罗马时期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翻译理论都是在这种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和意译（free translation）中艰难前行，直到“文本可译与不可译”的哲学本质突显。哲学对翻译的观照源于哲学对语言的探索。“语言是思想的家园”，哲学对语言（甚至对翻译）的精深思考为翻译理论拓开了一条哲学之路。

解释学对翻译研究影响最广，也最为深远。解释学的翻译观以文本理解为基础，强调“翻译即理解”（Steiner, 1998:1）。施莱尔马赫为了正确理解文本设计出了两套文本重构文案。海德格尔视翻译为一种思想实践，认为翻译应转渡（transfer）到文本意义表达结构之中，让语言言说自己。伽达默尔则认为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并提出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等具体的文本理解原则。对翻译客体（文本）的重视在符号学中得到了更多的张扬。

“翻译尽管是语言活动，但最合适的看法是将它看成符号学的分支”（Bassnett, 1991:13）。源于索绪尔的符号学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倾向，它将语言描述为服从于规则的社会符号系统，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系统，语言的意义来源于系统内的关系。这种符号学的翻译观将翻译严格框架在文本的语言符号系统之中。翻译研究成了纯粹的文本语言的对比研究。而源于皮尔士的符号学，由于将客观对象纳入符号体系，使符号直接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这种符号学的翻译观突破了文本的语言框架，将文本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奈达（E. A. Nida）的翻译理论发展就是这两种符号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即从早期的语言研究走向跨文化交际的探索。作为结构语言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雅各布森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从符号学角度对文本的语义、可译性、语言差异等翻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堪称经典。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其实论的并不是译者，而是语言。他借助对翻译的论述，来阐明自己的语言哲学观，即“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观点。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从认识论转向了语言论，哲学从此踏上了语言分析之路。语言哲学摒弃了主客体对立的理论预设，通过对“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语用研究，将主客体统一起来，其目标是在如何通过语言分析使语言更加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语言哲学的翻译观十分重视文本的语义分析，并开始结合翻译主体（译者）探讨翻译行为。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游戏”，将语言与生活、与文化相联系，语言不再是封闭自足的体系。“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语用”。同样，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也使对语言的分析转到了语言行为本身，转向行为的主体。“以言行事”使翻译研究不仅注重文本的概念分析，更注重文本的语用和语效分析。奎因则通过两个语言实验，引出经验观察在确定语义方面的不确定性问题，并最终证明“翻译的不确定性”。

不管是强调“文本理解”的解释学，还是注重“文本结构”的符号学，抑或是重视“文本语义”的语言哲学，它们看翻译更多的是聚焦在翻译的客体（文本、包括文本的语言与意义）之上，直到解构主义兴起。通过对结构主义（尤其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的解构，解构主义将翻译研究的重点成功

地推上了主体之路。福柯宣称“作者死了!”,从而使译者获得了自由;德里达则通过“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论述了符号并没有确定不变的意义,从而颠覆了原文文本中心论。译作成了原作的后世(after life),译者创造了原作者。韦努蒂更是站在解构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透明话语和通顺翻译在英美等强势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他的《译者的隐身》就是彰显翻译主体,让译者现身。

受解构主义冲击,翻译研究由从单一的语言学角度的建设转变成了多元取向的重构。政治、文化、经济、权力以及社会制度等等,都被纳入到翻译研究范围之内。但不管是翻译目的论还是翻译的操纵学派,女权主义抑或是翻译的文化学派,其研究重心都是向翻译主体的趋近。

谢天振教授在阐述当代西方的译论发展特征时,将之概括为“三个根本性的突破”。首先是“从一般层面上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然后是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到对“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纵者和接受者”的研究。最后是“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的多元研究。(谢天振,2003:24~26)可以看出,翻译研究在不同哲学思潮的推动下,经历了一次由客体到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巨大转变。

本书尝试从宏观上系统梳理西方哲学与翻译研究的渊源关系,就西方哲学思潮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做一番历史性的回顾和评介,并通过反思,探究和发现中国哲学思想对翻译理论的作用和贡献,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提供哲学理据。

本书包括四个主要部分: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绪论“语言、哲学与翻译”是全书论述的基础。正文“西方翻译研究的哲学之路”分为六章从对“可译性”的探讨开始翻译与哲学的联姻,到注重文本理解的翻译的解释学观,到强调符号(或语言)结构分析的翻译的符号学观,到关注语言意义的翻译的分析哲学观,再到解构原文、解放译者的翻译的解构主义观,最后是当代“文化转向”后强调译者权力意识的翻译的多元研究与哲学情结。结语部分简要回顾和总结了受哲学思潮影响的翻译研究,从客体到主体的发展历史。附录部分

是笔者对中国哲学思想与翻译关系所做的反思。

全书以哲学大家为“经”，以其对翻译的哲学思考为“纬”，纵横交织展示翻译研究的哲学渊源；并以哲学思潮为“面”，以人物言论为“点”，以点带面表现哲学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从这个结构来看，它更像是一部西方哲学对翻译研究的关怀史。

目录 >>>

CONTENTS

翻译研究之哲学启示录

第一部分 西方哲学的翻译之维

绪 论：语言 哲学 翻译	3
0.1 语言与哲学	5
0.2 语言与翻译	9
0.3 哲学与翻译	14
第一章 可译性问题——翻译本质的哲学观	18
1.1 翻译与哲学联姻	18
1.2 可译与不可译	23
1.3 洪堡特的语言哲学观与翻译	46
第二章 “翻译即理解”——翻译的解释学观	54
2.1 概论	54
2.2 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解释学与翻译	57
2.3 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解释学与翻译	66
2.4 迦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与翻译	71
2.5 小结	82
第三章 “翻译即换符”——翻译的符号学观	84
3.1 概论	84
3.2 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与翻译	88
3.3 雅各布森的《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96
3.4 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	103
3.5 小结	112

第四章 “翻译即译义”——翻译的分析

哲学观	113
4.1 概论	113
4.2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与翻译	115
4.3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与翻译	132
4.4 奎因的两个语言实验与“翻译的 不确定性”	139
4.5 小结	147

第五章 “翻译即重构”——翻译的解构

主义观	151
5.1 概论	151
5.2 福柯的《词与物》与翻译	153
5.3 德里达的《巴别塔》与翻译	160
5.4 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	171
5.5 小结	179

第六章 “翻译即征服/操纵、改写”——翻译的

多元研究及其哲学情结	180
6.1 概论	180
6.2 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与翻译的目的性论	181
6.3 尼采的权力意志与翻译的文化转向	187
6.4 话语、权力与翻译	193
6.5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	200
6.6 小结	207

第二部分 中国翻译理论的哲学之维

概论	211
----------	-----

第七章 “名”与“译”——中国古代哲学的

语言观和翻译观	212
---------------	-----

7.1 “名”——中国古代哲学的语言观	212
7.2 “译”——中国古代哲学观照下的 翻译观	216
第八章 佛教哲学思想与佛经翻译	219
8.1 佛经翻译与哲学融合	220
8.2 佛经翻译中的翻译理念	222
8.3 佛教哲学对佛经翻译的影响	229
第九章 严复的哲学思想与“信、达、雅”	232
9.1 严复的儒家哲学思想	233
9.2 严复的进化论思想	234
9.3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	236
第十章 中国当代哲学家与翻译	239
10.1 艾思奇的“论翻译”	239
10.2 贺麟的可译性理论	244
10.3 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	247
10.4 陈康的不可译论	252
10.5 冯友兰的翻译解释论	254
第十一章 小结	257
结语	260
参考文献	263

第一部分

西方哲学的翻译之维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绪论：语言 哲学 翻译

太初有道 (the Word)，道与上帝同，道即是上帝。

《圣经·约翰福音》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圣经·创世纪》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Babel，就是变乱的意思）。

《圣经·创世纪》

上帝在创造了万物之后，便休息去了。人禀承上帝的语言，为上帝给万物命名。这时人的眼睛还没有张开，他无法确认万物的模样。但他不用思考，更不用求证。所以，命名是随意的。人只是用自己的口传达上帝的声音（或语言）。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语言，是上帝给与人类的第一件工作/任务——命名。那是上帝的语言，是真理的语言，是命名的语言，是剔出一切意义之外的

纯之又纯的“纯语言 (Pure Language)”。

人被安置在伊甸园中。在这座乐园的正中央有一棵“知识之树 (Tree of Knowledge)。其上的果子是上帝所绝对禁止去吃的。不管是因为受撒旦的诱惑，抑或是人类自身的渴望，人最后偷吃了禁果。于是，双眼张开了，知道了世事的美丑，看到了万物的存在。哲学^①从此诞生了。

偷吃了禁果的人被赶出了乐园，流落凡尘。但失去家园的人类凭借从上帝秉承下来的统一的语言^②，重新聚集到了一起。出于对家的渴望，他们开始修建通天塔 (Babel Tower)，打算重返伊甸园。上帝害怕了。万能的主将人类的语言打乱，犹如打碎一个花瓶。不同的人只从那统一的语言中捡到了部分碎片。人们彼此言语不通，无法交流，通天塔的建造从此打住。人类在失去存在的家园 (伊甸园) 之后，上帝又让人类失去了统一的思想家园^③。但是，在变乱的语言中，翻译诞生了。这个新生儿从他出世的那一刻起，便被寄予了人类一个生生不息的梦想——再建通天塔，重返伊甸园。

在《圣经·创世纪》故事中，是上帝的语言直接召唤了万物，使万物因道 (the Word) 而存在，这是“存在论 (又称本体论)”的起点；人偷吃了“知识之树 (Tree of Knowledge)”上的禁果从而获得了知识，有了善恶好坏美丑的认识，于是，“认识论 (又称知识论)”开始。为此，人失去了乐园。但秉承了上帝统一的语言的人们，着手建筑通天塔 (Babel Tower) 要重返伊甸园。上帝害怕了，他打乱了人们的语言，语言的问题出现了。人们因语言不通而无法交流不得不弃塔而去。这里分明勾勒出从“存在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的哲学发展的三次飞跃。

① 哲学一词的希腊语 *philosophia* 意指“爱智慧”，即追求知识之学问。而且，古希腊的哲学也的确是从 (人睁开双眼后) 确定“什么东西存在”的本体论开始的。

② 这是建造通天塔之前的语言，故又称前巴别语 (pre-Babel language)。

③ 海德格尔称：“语言是思想的家园。”

0.1 语言与哲学

汉语中本无“哲学”二字。日本近代学者西周借用中国古汉语，首先将西方 philosophy 译作“哲学”。1896 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等人把日本的译称介绍给国人，后渐通行。其时，何以如此译法，已无从考证。笔者妄究，仅作参考。

《说文》：哲，知也。从口，折声。

“知”实为“智”，是聪明之意。此解与希腊语 philosophia 的词义“热爱智慧”（philein “热爱” + sophia “智慧”）很是相合。另有，

《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

“知人”就是了解人。了解人之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它是对存在者自身的认识 and 了解，这种了解本身就是一个观察与思考的行为过程，连接的双方是行为的主体与客体。它以“人”为本，构成了“哲”的本体论意义。而且，“知人”这一行为本身就带有了“如何知”的方法论。

“知”，知性，认知，知识。于是“哲”就成了关于人的认知的学问，就有了知识论的意义。

再则，“哲”字可拆成上下两部，上部又可分为左右两旁，于是就成了“扌”、“斤”、“口”。“扌”通“手”，意为动手，即行为、行动之义。“斤”，斧头，指工具^①。“口”，即嘴，又指说话、言语。三者合一便有此引申：“哲”与行为有关，是坐而论，更是起而行；与工具有关，是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

① 《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工具；与语言有关，因为知识的最主要的表达形式就是语言，求知，首先要求语言。

如果说中国人把哲学所代表的智慧理解为所谓的“世界观”、“方法论”，那么希腊以来哲学家们所理解的哲学“智慧”则主要是指“知识”。前者是以价值判断为根据的，后者则是以事实判断为前提。前者以求“用”（人生的解脱，灵魂的救赎，生活的艺术等等）为宗旨，后者求“真”（普遍、客观、绝对的知识）而未必求“用”。（方朝晖，2002：28）故，一些西方哲学工具书都认为philosophy应理解为“love of knowledge”而非“love of wisdom”，因为“智慧”一词含义太广。（Edwards, c. 1967：216）

“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959）

人类思想的上下求索展开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画卷。当思想收起想象的翅膀，告别神话和原始图腾之后，它返回到了本体，开始追问和探求万物存在的始初和本源。正是在这种对“存在问题”的追问之中，哲学思想的火花喷溅而出，它不仅构成了哲学思想在时间上的起点，亦构成了哲学思想在逻辑上的起点。一句话，哲学始于对“存在”的反思，而“存在问题”就是本体论问题。

“本体论”一词译自拉丁语 ontologia，又称“是”论。该词为17世纪的德国经院哲学家郭克兰纽（R. Gocleneus, 1547~1628）首创。他是根据希腊词 on 的复数 onta（“诸存在者”）加上 logos（“学问”）构成的。从构词上看，该词应该是关于“存在者”的学问，想来译成“本体论”倒是有失原义，还不如改成“存在论”来得直截了当，而且存在问题确是所谓的“本体论”问题。这一问题最先是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keia, 公元前5世纪）找到的，所以他成了西方本体论的鼻祖。他是怎样找到的呢？方法就是通过发现语言所隐含的客观思维，找出存在者的逻辑前提和逻辑根据。他把握住了“存在”（to be）这个判断句的系动词，将其表述为第一个纯思范畴——存在。可以说，从

西方本体论一开始，哲学便深深扎进了对语言的沉思之中。而给巴门尼德指出语言之路的人就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 540～前 480），是他创造了逻各斯学说。

逻各斯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中心课题之一，乃至近年来还常常听到有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逻各斯（logos）”在希腊语中原义是“语词”，转义为“道理”、“普遍规律或法则”。赫拉克利特首先用它表示蕴含在语言中的普遍法则，即“道”。他认为是语言构成了人们的一个共同的世界。可见，语言根植于 logos 之中，注定与之形影不离。

“logos 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言谈所谈及的东西，而这个看是对言谈者来说的，也是对相互交谈的人们来说的。言谈让人从某种东西方面来看，让人从话题所及的东西本身来看。”

（海德格尔，1999：37～38）

显然，在海德格尔看来，logos 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讲话或言谈。

一般认为，logos 一词具有三层意思：自然规律（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以及言说（dialogue）。迦达默尔说，逻各斯往往译为理性或思维，但其本义应为语言，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句话，其实就是“人是语言的动物”。无独有偶，汉语中的“道”字也恰好兼有“道理”与“说话”二义。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构型中，“道”应该是最根本的范畴，说得夸张一点，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核心内容就是一条条对人如何明道、体道、立道和行道的思索之路。巧合的是，同西方的逻各斯（logos）一样，“道”的本意中也有“言、说、语”的一层意思。语言是“道”的一部分，“道”与语言休戚相关。

早期对“道”与语言的关系的把握，当属“老子”天下第一。老子（约公元前七世纪）在其五千言的《道德经》中，大量融入了他对语言的深切体悟和